

最后密友范图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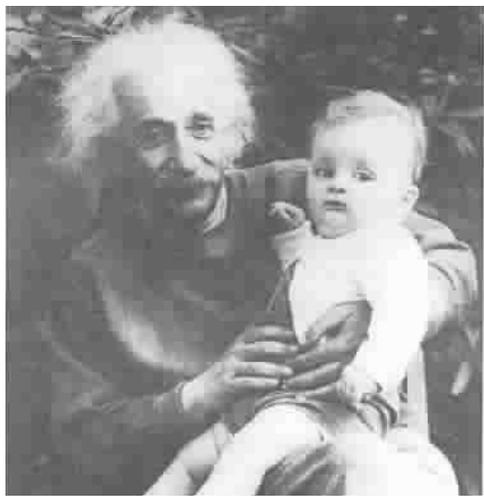
爱因斯坦晚年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时,身边有一位鲜为人知的女友相伴,她的名字叫作约翰娜·范图娃。晚年的爱因斯坦在感情方面不再拥有激情,个人情感日趋淡化,他郁郁寡欢,宣称自己最理想的职业是做一个灯塔的看守人。就在这时,范图娃为孤独的老年爱因斯坦带来了一丝甜蜜和慰藉。与其说范图娃和爱因斯坦是情人,不如说是密友更恰当,范图娃可以说是爱因斯坦最后的女朋友。

范图娃曾在私人日记中默默记下了晚年爱因斯坦的喜怒哀乐,她在日记中称,她记这本日记只是想让人们知道,爱因斯坦“不仅是一则科学传奇,一个著名的科学家,他同时还是一个富有人性的人”。范图娃的日记从1953年开始写起,直到1955年4月爱因斯坦在七十六岁那年去世为止。

范图娃1901年生于捷克的布拉格,比爱因斯坦小二十二岁,毕业于布拉格大学。她很年轻的时候就嫁给了布拉格的望族凡塔家的奥托·凡塔教授。1929年在柏林,通过丈夫,范图娃认识了爱因斯坦。世事变化多端,1933年爱因斯坦和妻子艾尔莎来到普林斯顿大学,三年后,艾尔莎去世。1938年德国入侵捷克,范图娃随丈夫去了伦敦,第二年即1939年,她的丈夫奥托在伦敦去世。

20世纪40年代初,范图娃应爱因斯坦之邀来到美国,专门帮助爱因斯坦进行私人图书馆的组建工作。有一段时期,范图娃就像助理一样每天去爱因斯坦的住处,帮他整理凌乱的书籍。后来,范图娃在爱因斯坦的鼓励下,考入北卡罗莱纳大学图书馆学院深造。毕业后,心系爱因斯坦的范图娃,来到爱因斯坦住

爱因斯坦的情感冒险(4) ◆ 裘伟廷



老年爱因斯坦很喜欢小孩

所附近的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工作,并于1952年担任该图书馆的地图馆馆长。

天才的乡愁与孤独

在普林斯顿的十多年中,范图娃经常去看爱因斯坦;无法探望的时候,两人就打电话。爱因斯坦差不多每天夜里都打电话给范图娃,细说自己一天的经历与感想,叙叙二战前各人在欧洲的日子。从战前德国来到美国避难的爱因斯坦,怀念的依然是二战前的欧洲。对于爱因斯坦来说,范图娃是旧欧洲的一部分。她为他朗诵歌德的诗,陪他一起在附近的卡内基湖上泛舟,她是他与失落世界的一个联系,她是他的欧洲乡愁。

老年爱因斯坦与范图娃交谈

时,时常自比一部老爷车,零部件经常出现一些问题,比如他那糟糕的记性,令他老是丢三落四。他还抱怨家中会来太多的访问者和仰慕者,因为他们经常要求爱因斯坦摆好姿势供他们拍照,或者合影留念。爱因斯坦后来实在不堪其扰,只好装病,往床上一躺,盖上被子,装出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这样一来,再虔诚的访问者也不好意思将一个“病人”从床上拉下来拍照了。

爱因斯坦的同事们都将他视为一个“时代错误”。当同时代的科学家都热衷于分裂原子、制造原子弹和发现新粒子时,爱因斯坦却开始重新修订更加高深莫测的“统一场论”。对于许多物理学家同事来说,“统一场论”太高深了,与他们的研究并不相干。爱因斯坦对范图娃说:“物理学

家们说我是一个数学家,而数学家们又说我是一个物理学家。在科学界,我是一个找不到同伴的人,尽管每一个人都认识我,我却仍是这么孤独。几乎没有人真正了解我。”

“老顽童”顽强抗争

七十四岁的爱因斯坦曾感慨,他的朋友们死的死,散的散,陪他的除了范图娃就只有三个人,那就是每天早上一起散步到研究所的哥德尔,中了风的妹妹马雅,从德国带来的秘书杜卡斯。此时,外面的环境是风声鹤唳的麦卡锡主义,给追求自由自主的爱因斯坦留下了更多的伤痕。当时,爱因斯坦的好友、“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由于反对美国制造氢弹和主张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因此受到迫害,被逼离开

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爱因斯坦对此愤愤不平,他对范图娃说,在美国没有人比奥本海默更了解原子能。因此他给后来的美国原子能委员会起了一个新名字——原子灭绝阴谋委员会。

在爱因斯坦晚年的岁月里,范图娃主动承担起照顾他的义务,甚至还担当起他的理发匠,为他修理他那乱蓬蓬的长发。有时爱因斯坦就像一个“老顽童”,即使他真的生病了也忘不了自娱自乐。范图娃在日记中写道:“(晚年)爱因斯坦的健康开始恶化,可是对于自己最大的爱好——驾驶那条近乎原始的小船出航——却依然乐此不疲。他的心情从来不会像那时这般开朗。”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爱因斯坦对这位“末代女友”情意绵绵,经常给她写信寄照片,甚至还写过多首情诗。一次,爱因斯坦多日没有见到她,他写道:漫长的寂静使我精疲力竭/但愿你能看到/在我的大脑里有个小小的阁楼/那里永远藏着对你的思念。爱因斯坦的信、照片和诗,其中相当一部分成为范图娃日记的“素材”。

1955年爱因斯坦去世之后,范图娃将这些珍贵的资料出售给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前馆长格里芬。后来,格里芬又将它们无偿捐赠给了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这本日记真实地记录了爱因斯坦晚年与疾病和衰老的顽强抗争,以及他的情感,它是迄今为止关于爱因斯坦晚年生活绝无仅有的原始记录。范图娃本人于1981年逝世。

摘自《名人传记》8月刊

沈寂口述历史

沈寂口述 葛昆元 撰稿



9. 被格致公学开除

半年后,回到上海,格致公学已经不能上学了,学校设法租了北四川路青年会两层楼面作教室上课。

1940年3月,汪精卫叛国成立伪政权。汪伪的“国旗”上写有“和平救中国”字样。我和同学毛乾丰都憎恨汪精卫卖国,想学四行仓库八百壮士升国旗。我对他说:“在学校里升我们自己的国旗。”我们买来一面国旗。但教室里无处可挂。毛比我还小一岁,长得比我还矮,国旗怎么升呢?青年会三层楼,都是教室,国旗挂在哪儿呢?就只能挂在楼梯上。我去找来一只凳子,站到凳子上,刚挂上去,就听到脚步声,我急忙下来和毛乾丰跑开。后来我看到又有两个同学也来挂国旗。

我们在四川路青年会待了半年后,学校又搬到外滩的一家银行里去上课。我进格致公学初一读过的课里,有化学。我很喜欢化学,但我们读化学都是纸上谈兵,因为没有实验室。物理也是。这个时候我懂得读书了。因为我懂了,你要爱国,就要有本事、有知识。有个体育老师对我们说,身体一定要好,身体好了才能爱国,才能打日本强盗。

我这个时候,初一跳级了,读了半年初二就读完这三个。我们这一班同学真好。钱春海、周永昌、吴宗锡等读书都很好。蒋礼晓、毛乾丰、薛根福和我成立小组,看进步书籍,读英文小说。不久,我们学校又搬到西大(今延安西路)的一个军营里上课。离家很远,我每天坐黄包车去读书。我们四个人对抗日都有热情。思想进步的蒋礼晓主张出一本油印刊物叫《合群》,他还带头写文章,毛乾丰等也写了,他们让我也写一篇,我写了,但已想不起来写了什么内容。印好《合群》,一张两面,我们在教室外贴出来,还贴在操场旁边的墙上和布告栏里。第二天,有个叫吴庆德的同学,即吴学谦,他是当时格致公学里的第一任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委员有钟沛璋、程念梁等。他来找我们,戴了副眼镜。他劝我们这

样张贴虽然影响大,但很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容易出危险。还让我们用别的方法宣传抗日。

“文革”结束后,吴学谦到上海,看望格致中学的老师,还要来看看格致中学。我应邀去接待他,我和他讲起这件事。他听起来,说是此事,我们还一起合了影。

就在我们第二期《合群》已经印得差不多时,校长派人来把蒋礼晓兄弟从我们上课的教室里叫出去。他们回来后就把整理书包开除了。我知道,蒋礼晓和他哥哥蒋礼平被开除了。放学后,我和毛乾丰想去看看蒋礼晓,结果在校门口被人拦下,让我们去校长室。见我们的是副校长,爱尔兰人,名叫萨日登,我们叫他“赤豆汤”。他用英文和我们说,旁边有个张老师做翻译,他说蒋礼晓兄弟已被开除了。你们俩,我们就不开除了,但你们俩是停学。我听了立刻说:“我们情愿被开除!”从此,我和毛乾丰离开了格致公学,这是我一生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被格致公学开除出来后,我不敢和家里人讲。没办法,只能每天去图书馆读书。我常去的是八仙桥青年会图书馆。当年八仙桥青年会里爱国人士的活动特别多,有个叫丁光训的牧师负责,他是中国宗教界的抗日爱国人士。从此,我每天装着去学校上课的样子,到八仙桥青年会图书馆去看书。图书馆8点开门,我们8点半进去。有个女管理员借书给我们。我们上午借一本,下午借一本。看了大量的小说。后来熟悉了,晚上还能借出来看。后来,我发现一本书,叫《皮包与烟斗》,作者巴人。我想这个巴人,和我牺牲的小娘舅认识的,父亲和我说起过他。这样我就开始看他的小说了。原先我看的是西洋小说。这时,巴人是上海文化界的领导之一。他邀请了几个作家如田青、束秋秋、何为等在《译报专刊》写稿。这本刊物青年会图书馆也有。何为的文章是介绍新四军的,说新四军怎么好。我在图书馆看书大概半年不到,图书馆里的小说书、舞台剧本等我都看遍了,其中如巴金的《家》,矛盾的短篇小说,以及其他“五四”时代作品。从此我成为文学爱好者,并走向文学道路。空闲时,我还是看电影,看话剧。有时看美国电影,话剧有吴祖光的《正气歌》、曹禺的《蜕变》等,振奋人心。

《曾少年》是女作家九夜茴(代表作《匆匆那年》《花开半夏》)历时五年写就的最新作品。“这部小说几乎写了我成长中遇见的所有人和他们至今为止的人生”。小说即将改编成电影。

1. 发生了一件大事

我出生那天,北京下了好些天的雨停了,天晴得终于有了盛夏的样子。院子里紫色的喇叭花都开了,串红也已经能吸出蜜来,枣树和槐树遮住一片阴凉,蝉声一阵一阵的。天空中有蜻蜓飞过,时还有几只黑白花的天牛。

乘凉的老人们聚在一起,老奶奶推着竹车,哄着孙子和孙女,老爷爷一边摇着蒲扇一边下着象棋。他们从不观棋不语,常常为了跳马或是支士而争论不休。小卖部里挂出冰镇北冰洋汽水的牌子,小贩在白色的小木箱上盖一层棉被,里面有奶油雪糕,也有小豆冰棍。

胡同里的孩子成堆,男孩们玩弹球、拍画儿,也有抓蟋蟀的,放在玻璃罐头瓶里养起来,罐子上面要糊一层纸,用皮筋捆紧,再扎几个小孔透气。他们会给蟋蟀起名字,什么“常胜将军”、“山大王”,再把它们放在一起让它们斗。女孩们玩跳皮筋,缺人抽筋就把皮筋绑在电线杆上。她们也“跳房子”,拿碎红砖或是家里裁衣服用的滑石在地上画线,小沙包都是碎布拼的,灰乎乎的看着不清颜色。

虽然就在胡同西口就是繁华的东单大街,但在胡同里面丝毫感觉不到喧嚣,偶尔才有几辆自行车骑过,不是永久就是凤凰,都是黑色的,连车把上的铃都一样。也难怪,不只自行车,那时家家过的日子都差不多。北京的变化尚还细不可闻,也许谁说一句话,这座城便可一模样起来。

然而就在我生日那天,发生了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我们院东屋的辛伟哥被警察抓走了,说他与西大院那个外号叫猴子的男孩一起在女厕所外面耍流氓。辛伟哥的弟弟辛原在一旁觉得不好意思,喊他们俩走,辛伟哥嫌他烦,不但不听他的,还踹了他一脚。辛原一个人哭着回家,正巧碰见居委会的赵主任出来倒尿盆,辛原顺口向他告了状。赵主任

脸沉下来,哄了他几句,也不倒尿盆了,匆匆地转身就走。

中午,警察就来院里抓人了,说他们犯了流氓罪。有人犯罪了,这可一下炸了窝。正巧赶上礼拜天,大人小孩全出来看。辛伟哥平时是院子里最调皮、最神气的男孩,可那天吓得腿都站不直了,18岁的大小伙子,被人硬是从屋里架了出来,一边走一边哭,又喊妈又喊奶奶,“呜呜”地也听不清说了些什么。

警察来那会儿,辛原正在院门口跟一帮小孩玩“我们都是木头人,一不许说话二不许动”。他就真像木头人一样,一动不动地站在院墙边上,看着小伙伴们都跑过去瞧热闹,看着他哥被警察拖走,看着他奶奶坐在地上大哭,看着院子被一层又一层的人围住,把他彻底围在了外面。

在我后来的印象里,辛原一直不爱说话,总低着头,跟他打招呼,他都不看你的眼睛。有人说就是因为辛伟哥被抓,他被唬住了,所以下变成了不说话的闷葫芦。可我想,他也

许从那天起,就再没有从木头人变回来。当然,这些我一点都不记得,我才刚刚出生,因为辛伟哥的事,大家都把老谢家新添了一个叫谢乔的小丫头给彻底忘了,以至于院里还有人以为我是立秋以后才出生的呢。

只有我的小船哥清清楚楚地记得我,这些都是他讲给我听的。

我听过一种传说,人之所以记不得一岁以前的事,是因为在婴儿时脑子里还残存着前世的记忆,直到慢慢有了今生的记忆,关于前世的过往才全部忘了,所以那段时间就成了我们生命中的空白。我惧怕那段空白,于是就追问我妈,我是从哪儿来的,我怎样被生下来。我妈说,我出生之前是一只小蚂蚁,她从一堆小蚂蚁中把我挑了出来,找医院里的大夫吹了口仙气,小蚂蚁就变成了我。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暗自庆幸是自己而不是别的蚂蚁被挑了出来。我因此对蚂蚁有特殊的好感,从来没故意踩过它们,也没拿放大镜在太阳底下烧过它们。下雨天蚂蚁搬家,奶奶拿开水壶去浇院子里一窝一窝的蚂蚁时,我还狠狠哭了一鼻子。

曾少年

九夜茴

